

《世说新语》宋刻本对唐抄卷刘孝标注文删改现象论略

——兼论“减注”的文体意义

王 乙 珈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摘 要:《世说新语》的文本传播在南宋绍兴八年(1138)董弅刻本面世后正式进入印本时代。然而,宋刻本对唐抄本的刘孝标注文有较为集中的删改,或为字句脱讹,或为大段删削。本文在文献比勘的基础上,对宋本删改刘注的特点和原因加以分析,其一为删除易让宋人产生歧义的官职、郡望名,其二为添加“别见”“已见”结构,使注文体例臻于完整。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减注”现象所折射出的文体意义。

关键词:《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减注;文体意义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0)03-0041-08

doi:10.19742/j.cnki.50-1164/C.200306

南宋前,《世说新语》皆以抄本的方式传播。刻本行世前各家藏本情况大致有《崇文总目》著录本(1种),黄伯思《东观余论》著录本(4种),汪藻《世说叙录》所载本(15种),董弅家藏本(2种),赵明诚、李清照家藏本(1种),惜皆不传。迄今所知的仅日本所藏唐抄残卷一种(简称“唐抄本”),题《世说新书》,庶几可窥见《世说新语》文本的早期形态。南宋高宗绍兴八年(1138),董弅于严州首次对《世说新语》进行刊刻(简称“董本”),并校订为三卷本,自此《世说新语》的传播进入印本时代。此后宋人争相翻刻,今所知者,有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陆游刻本(简称“陆游本”)和淳熙十六年(1189)湘中刻本(简称“湘中本”)。

董本原书不存,今存两种翻刻本:其一藏于日本尊经阁文库,其二藏于日本宫内厅书陵部。陆游本亦不可见,今存明嘉靖十四年(1535)袁褧嘉趣堂重雕本(简称“袁本”);湘中本原藏于徐乾学传是楼,惜下落不明,唯余清雍正时人沈宝砚以湘中本校订袁本时所留数十条校勘记,可知湘中本文字与袁本多有不同。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影印袁本时,附沈宝砚“世说新语校语”于书末。“涵芬楼得一校本,盖雍正庚戌沈宝砚以传是楼宋本校袁本,而嘉庆甲戌吴春生过录者也。袁本有淳熙十五年戊申新定郡守陆游跋,……两本同出于宋,玩其字句均以传是本为长。”(孙毓修识语)。笔者比勘后发现,除讹误处不一而足外,各宋刻本之间文辞大略相同。然而在最早的刻本——董本中,却与唐抄本风貌甚异:不仅多处字词不同,而且对抄本中的刘孝标注文(简称“刘注”)进行集中的删削和刊落。本文对宋刻本删削唐抄本中刘注的情况加以梳理,并据此对宋代肇始的“减注”现象的文体意义加以探讨。

一、董本对唐抄本“刘注”删改现象举隅

虽然唐抄本仅存“规箴”“捷悟”“夙慧”“豪爽”四门,但在文辞上却与宋刻本有诸多差异。由于董

收稿日期:2019-09-18

作者简介:王乙珈(1991—),女,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小说。

本为《世说新语》最早的刻本,且后出诸本皆为翻刻董本或依董本所出,故本文选取董本为宋刻本代表,与唐抄本进行比对。笔者比勘后发现,唐抄卷与董本的文字差异共462处,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文意一致的个别字词出入,如董本将“手不释书”作“手不释卷”(规箴5·注文)、“柱石之臣”作“柱石之用”(规箴17),以及不属于衍脱文的字词增删,如“举(为)秀才”“君非从善论议(而已)”“车(牛驴)马”等等,此不赘述。董本与唐抄本最明显的差异在于对刘注有较为集中的删改和刊落。在四门52处刘注中,48处有文辞修改情况,其中整句或大段的删改共17处,举例分析如下。

一方面是个别字词的改动,多为唐抄本正确而董本讹误者。如规箴4“何晏、邓颺令管辌作卦”条^[1]注文征引大段《辌别传》中文字,其中有云:

唐抄本:邓曰:“此老生之常谈。”辌曰:“夫老生者,见不生。常谈者,见不谈也。”

董本:邓曰:“此老生之常谈。”又曰:“夫老生者,见不生。常谈者,见不谈也。”

此段为成语“老生常谈”的出典。董本将“辌”改为“又”,即是将管辌之语归为邓颺所说,误。若依董本,则与前文管辌劝邓颺安分守己、莫作非分想,却被邓误会为空话敷衍的文意不符,无法凸显管辌不卑不亢的性格。

又如捷悟3“绝妙好辞”条注文:“孝女曹娥者,上虞人。……娥年十四,号慕思盱,乃投衣于江,存其父尸曰:‘父在此,衣当沈。’旬有七日,衣偶沈,遂自投于江而死。”唐抄本“投衣于江”中,“衣”字董本作“爪”,袁本作“瓜”,于文意皆不顺。后世引及此段内容,皆延宋本之误而不加审。然而《水经注》卷四十有云:“浦阳江……江水东径上虞县南,江之南有《曹娥碑》,其父盱,迎涛溺死。娥时年十四,哀父尸不得,乃号踊江介,因解衣投水,祝曰:‘若值父尸,衣当沈;若不值,衣当浮。’裁落便沈,娥遂于沈处赴水而死。”^{[2]589-590}可见唐本作“衣”为是,董本等或因草书形近而误。规箴25“桓南郡好猎”条注文,唐抄本为“道恭祖猷,彝同堂弟也”;董本作“道恭字祖猷,彝同堂弟也”,增一“字”,实谬。桓道恭其人,见于《晋书》卷八十五《刘毅传》,且据《晋书·桓玄传》,桓彝为桓玄之祖,桓南郡即桓玄,为权臣桓温幼子(桓温五十八岁时生),兵败后为刘毅所诛杀。若温于玄被杀之时仍在世,当已94岁;若道恭为桓彝兄弟,于玄则为从祖,则桓玄兵败之时当已百岁,显然与史实不符。因此,当是道恭之祖名猷,是桓彝堂弟。

虽说以上的字词改换多是唐抄本优于董本,但董本也并非一无是处。董本在多处改正唐抄本语意,使之畅达。如规箴“孙休好射雉”条注文,唐抄本作“休字子烈,齐太皇帝第六子也。”董本作:“休字子烈,吴大帝第六子。”孙权谥号“大帝”,故应以董本为是;唐抄本“齐太皇帝”的说法,不知从何而来。又有规箴4“何晏邓颺令管辌作卦”条注文,唐抄本言“项连青蝇数十头来鼻上”,颇为齟齬;董本改作“梦青蝇数十来鼻头上”以顺句意。同样在此段唐抄本的刘注中,还出现了两处涉及《易经》的讹误:

唐抄本:然后据鼎足而登金,调阴阳而济兆民;董本:然后据鼎足而登金铉,调阴阳而济兆民。

唐抄本:谦则哀多益寡,壮则非礼不履;董本:谦则哀多益寡,大壮则非礼不履。

唐抄本中的“金”“壮”二处指向不明,颇为费解。董本改为“金铉”“大壮”则清晰明了:“铉”指代三公等重臣,又《易》鼎卦:“六五,鼎黄耳金铉,利贞。《象》曰:鼎黄耳,中以为实也。”^{[3]390}指身居高位而为万民谋福祉;“哀多益寡”出自《易》谦卦:“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3]128}又《易》大壮:“雷在天上,大壮;君子以非礼弗履。”^{[3]260}即君子须衡量诸事利弊而公平施予,身处高位亦要守正循礼,符合管辌劝说邓颺的语境。除却这些明显漏误外,董本还改正了唐抄本中诸如“死于凡下”“婆乐神”“成败由人在”等讹误,此不赘述。由此可知,在字词差异上,董本纠正润色了诸多唐抄本错误,而唐抄本优于董本的部分,大多为史实的正确或材料的殷实。

除却字词的细微差异外,另一方面,董本于多处大段删削刊落唐抄本原有的注文。兹举数例如下(着重号部分为唐抄本独有):

(1)规箴“何晏、邓颺令管辌作卦”条注:

轲字公明,平原人也。八岁便好仰观星辰,得人辄问。及成人,果明周易,仰观风角占相之道,声发徐州,号曰“神童”。冀州刺史裴徽召补文学,一见清论终日,再见转为部钜鹿从事,三见转为治中,四见转为别驾。至十月,举为秀才。……

(2)规箴“王大不平其如此,乃谓绪曰:‘汝为作此款款,曾不虑狱吏之为贵乎?’”注文:

史记曰:“汉丞相周勃就国,有上书告勃反,文帝下之廷尉。吏稍侵辱,勃以千金予狱吏,吏赦勃。以其子妇公主为证,帝于是赦勃,复爵邑。勃既出,曰:‘吾尝将百万之军,安知狱吏为贵耶?’”

另有规箴“王绪、王国宝相为唇齿,并弄权要”注文、捷悟“郗司空在北府”条、夙慧“晋明帝数岁”条等多处注文皆被大段删削,兹不赘述。

宋人对刘注的删削,主要基于与正文的关系上,即刊落与正文内容无关或枝蔓的部分。而从这些删削修改的内容则可以发掘些许共同特点,从而窥见宋人修改经典文本注文背后的用意。

二、宋刻本删削刘注的特点及功用

除却显而易见的大段删削外,在文字细部,宋本删削的刘注内容也有共性。笔者通过文字比勘后发现,董弅本常常对唐抄本的人物郡望、官职名、地名加以删削。列表如下:

	出处	唐抄本	董本
1	规箴“孙皓问丞相陆凯”注	《吴录》曰:凯字敬风,吴郡吴人	《吴录》曰:凯字敬风,吴人
2		邓尚书曰	邓曰
3	规箴“晋武帝既不悟太子之愚”注	朝廷百僚咸谓太子不能亲政事	咸谓太子不能亲政事
4		跪世祖床前曰	跪床前曰
5		性游侠,为幽州	性游侠
6	规箴“元皇帝时”注	避汉安帝讳	避汉帝讳
7		为吴国内史,迁太常太傅,赠司空也	为吴国内史
8	规箴“王丞相为扬州”注	累振威长史、尚书吏部	累迁振威太守、尚书吏部郎
9	捷悟“郗司空在北府”注	平北将军愔及袁真	愔及袁真
10		领愔所任,授愔冠军将军,会稽内史	领愔所任
11	夙慧“桓武薨”注	都督七州诸军事,荆州刺史薨,赠太尉	都督七州诸军事
12	豪爽“桓宣武平蜀”注	仕至晋寿太守	曾作敦掾
13	豪爽“桓石虔,司空豁之长庶也”注	赠司空,谥敬也	赠司空
14		仕至豫州刺史,封唐县,赠后军将军	仕至豫州刺史,赠后军将军

通过以上例证发现,第1、5、10、11、12、14条均是对地名或涉及地名的官职的删除。其背后的原因,主要与方便宋代读者阅读有关——董本有意删除会产生误解和歧义的地名。如“吴郡”是东吴时期的称谓,隋开皇三年,“文帝罢天下诸郡,以州统县”^{[4]792},故唐以后统称为“州”。隋唐两代虽有反复,但仍以州下为郡的行政单位设置为主:据《隋书》《旧唐书》等记载,隋文帝以州统县,隋炀帝恢复郡制;唐建立后,唐高祖李渊复改郡为州,唐玄宗时期又将州改成郡,直至唐肃宗最终改为“州”。几经反复,但基本沿用“州—县”二级行政单位。两宋时期,苏州改称“平江府”,不再使用“吴郡”之称。因此,为便于读者阅读,注文将“吴郡”删除。董本改动较多处,为今古有歧义之地名。如“为幽州”一条,“幽州”自两汉以来一直为北方军事重镇,辖境相当于今北京市、河北北部和辽宁南部,而宋代“幽州”则仅指北京一

地,且燕云十六州尚属辽国,并未归入宋版图。又如“会稽内史”,魏晋时期会稽为郡名,见《晋书·地理志》:“扬州统会稽、丹杨、吴、豫章、九江、庐江六郡,省六安并庐江郡。”^{[5]459}此地唐代称越州,在宋代称绍兴府。然而宋时绍兴府又下辖“会稽县”(见《宋史》卷六十一《五行志上》:“乙亥,会稽、山阴、萧山、余姚、上虞县大风,驾海涛。”“六月丁丑,台州及建德、诸暨、会稽县水,坏田庐。”^{[6]1335-1336}可见宋代“会稽”为绍兴府辖区,与魏晋时期行政区划大为不同),为避免宋人在阅读刘注时的歧义,董本加以删除也就不足为奇了。类似的情况,还有“荆州刺史”“晋寿太守”。魏晋时期,“荆州”属地极为广袤。《晋书·地理志》:“荆州统南郡、武昌、武陵、宜都、建平、天门、长沙、零陵、桂阳、衡阳、湘东、邵陵、临贺、始兴、始安十五郡,其南阳、江夏、襄阳、南乡、魏兴、新城、上庸七郡属魏之荆州。”^{[5]454}而宋时“荆州”更名为“江陵府”,且辖地缩小:“江陵府,次府,江陵郡,荆南节度。”“咸淳十年,荆湖、四川宣抚使兼江陵府事。”^{[6]2193}可见董本删削亦出于消解歧义之用。然而,董本并未对“豫州刺史”有删改,或因宋时已无“豫州”,不会再因行政区划的变动而产生误解,故而保留。

除却删除容易引起歧义和理解障碍的部分外,董本对刘注的删改也留下了宋人考据辨析的痕迹。如桓石虔“封唐县”条,在《晋书》卷七十四《桓彝传附桓石虔传》则记载为:“石虔小字镇恶。有才干,赳捷绝伦,……太元十三年卒,追赠右将军。追论平阎震功,进爵作塘(唐)侯。”^{[5]1944}在《世说新语》和《晋书》中,桓石虔的封地出现了“唐县”与“作唐”的异文。《世说》与《晋书》的文献来源皆不可考,若如《晋书》所载,桓石虔的封邑当在湖北公安一带;若以《世说》为是,则“唐县”属河北道。魏晋时期“唐县”并无其他记载。唐时,唐县属河北道辖区,参见《旧唐书》卷三十九《地理志二》;宋时为河北西路的下属县:“唐县,熙宁六年,省隆平县为镇入焉,元祐元年复。”^{[6]2129}而唐宋文献将“唐”与“作唐”混用的现象屡见不鲜,如《南史》卷三十六《江夷传附江禄传》:“湘东王恨之既深,以其名禄,改字曰荣财,以志其忿。……后为作唐侯相,卒。”文后校勘记云:“‘作唐侯’各本作‘唐侯’。按宋书州郡志有‘作唐侯相’,今据补。”宋人在无法明确判断孰是孰非的情况下,出于严谨而将其删除。还有“冠军将军”,亦是出于避免今人理解讹误的原因删除。因为魏晋时有“冠军将军”“冠军大将军”,而“冠军大将军”可谓叱咤风云的武将,《晋书》卷一百十六《姚弋仲载记》曰:“迁持节、十郡六夷大都督、冠军大将军。……朝之大议,靡不参决,公卿亦惮而推下之。”^{[5]2960}而宋代“冠军大将军”仅为正三品,地位与魏晋时期不可同日而语,故宋人为避免理解歧义将其进行删削。

但是,宋人的考证并非万无一失。最典型的例证是董本将“振威长史”改做“振威太守”。据《晋书·职官志》,“振威”为四品“振威将军”的省称(与之同级的将军称号分别有建威、建武;振威、振武;奋威、奋武;扬武、广武、宁朔、强弩),《晋书》中有“扬州刺史殷浩以为建威长史”^{[5]1544}“太原王述雅敬重之,引为建威长史”^{[5]2026}等说法,可见魏晋时期“长史”为将军负责参谋的幕僚,不涉及行政事务。直至南北朝时期才出现长史代理太守职,兼任行政与军事长官的职能:“南朝常以幼年皇子出镇诸州,于是长史就代行州府事,亦即代理刺史之职。……长史或司马还常兼任州所治郡的太守。北朝刺史暂缺时,长史也同样可代行州府事。”^{[7]221}因此,长史行太守职始于南北朝。宋人将不同时期的长史职能相混,才出现了将“长史”改做“太守”的错误。

不论如何,董本对刘注在官职和地名上的删改主要出于帮助阅读者理解和避免歧义的角度,一定程度上基于较为细致的理解和严谨的甄别。因此,董本有多处对唐抄本影响理解的省略部分加以补全,如唐抄本“轲至洛,果为何尚书所请去”条,董本将“洛”补为“洛阳”;唐抄本“《晋阳秋》曰:鯢为豫章”,董本则作“鯢为豫章太守”;规箴“元皇帝时”注:贺修别传曰(循)字彦先,会稽山阴人;“桓(宣)武薨”,等等。董本在崇尚简净的同时使语句平易晓畅、严谨通顺,从而使处于宋代的读者对《世说新语》更能无障碍地理解和接受。

宋人对刘注的修改,还体现在增添“别见”二字,以提示正文中反复出场的人物。“别见”即“另可参看”之意,往往用于对正文事件的补充和对其他文本的勾连。董本以“别见”提示的人物有周子居、袁山

松、贺循、谢鲲、庾翼、夏侯湛等24人,其中唐抄本涉及的,为规箴中“小庾在荆州”条注文:

唐抄本:亦见宋明帝《文章志》曰:“庾翼名辈,岂应狂狷哉?诸有若此之言,斯传闻之谬矣。”

董本:翼别见。宋明帝《文章志》曰:“庾翼名辈,岂应狂狷如此哉?时若有斯言,亦传闻者之谬矣。”

“别见”以《文章志》庾翼狂狷的记载呼应正文庾翼在荆州朝会上公然明言“我欲为汉高、魏武何如”的同时,又勾连其后文“识鉴”第十九“小庾临终”条“朝廷畏惮之”诸语。董本其余处出现的“别见”注文,可以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当正文中同时出现主要人物(或为描述主体)和次要人物(或为事件陈述者)时,注文采取对主要人物引书介绍,次要人物以“别见”表示的方法。如:

(1)周子居常云:“吾时月不见黄叔度,则鄙吝之心已复生矣。”注:

子居别见。《典略》曰:“黄宪字叔度,汝南慎阳人。时论者咸云‘颜子复生’。而族出孤鄙,父为牛医。颍川荀季和执宪手曰:‘足下吾师范也。’后见袁奉高曰:‘卿国有颜子,宁知之乎?’奉高曰:‘卿见吾叔度邪?’戴良少所服下,见宪则自降簿,怅然若有所失。母问:‘汝何不乐乎?复从牛医儿所来邪?’良曰:‘瞻之在前,忽焉在后,所谓良之师也。’”(德行2)

(2)张玄之、顾敷,是顾和中外孙,皆少而聪惠。注:

敷别见。《续晋阳秋》曰:“张玄之字祖希,吴郡太守澄之孙也。少以学显,历史部尚书,出为冠军将军、吴兴太守。会稽内史谢玄同时之郡,论者以为南北之望。玄之名亚谢玄,时亦称南北二玄,卒于郡。”(言语51)

(3)郗尚书与谢居士善。常称:“谢庆绪识见虽不绝人,可以累心处都尽。”注:

尚书,郗恢也。别见。檀道鸾《续晋阳秋》曰:“谢敷字庆绪,会稽人,崇信释氏。初入太平山中十余年,以长斋供养为业,招引同事,化纳不倦。以母老还南山若邪中。内史郗愔表荐之,征博士,不就。初,月犯少微星,一名处士星。古云:‘以处士当之。’时戴逵居剡,既美才艺而交游贵盛,先敷著名,时人忧之。俄而敷死,会稽人士以嘲吴人云:‘吴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棲逸17)

类似情况另有:言语107、雅量24、任诞43。此类情况,旨在介绍正文中主要人物的身份背景,对次要人物,则以“别见”提示参看其他注释或引书,从而一定程度上起到“立主脑,减头绪”的作用。

第二种情况是直接以“别见”表示而不加详细注文(往往出现在先前注文已对该人物有详细介绍之后),这在《世说新语》中较多出现:

(1)会稽贺生,体识清远,言行以礼。贺循别见。(言语34)

(2)谢仁祖年八岁,谢豫章将送客鲲,子别见。……《晋阳秋》曰:谢尚字仁祖,陈郡人,鲲之子也。(言语46)

(3)殷中军被废东阳,浩黜废事,别见。(文学50)

(4)袁宏始作《东征赋》,都不道陶公。胡奴诱之狭室中,临以白刃,胡奴,陶范。别见。(文学97)

类似情况另有:德行45、言语54、言语65、言语80、言语83、政事3、文学76、文学99、文学104、方正18、方正25、雅量37、识鉴26、赏誉85、赏誉147、任诞44。可以看出,唐抄本注文所没有的“别见”是董本注释的重要体例。囿于资料,无法坐实今董本中的另几处“别见”皆为宋人所增,但笔者翻检宋代文献后发现,“别见”的用法在宋人注释中甚为流行。如陈公亮《(淳熙)严州图经》“龙华寺在青溪乡”注文:“按:宝大、宝正皆钱氏年号。别见《事志》。”^{[8]17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吏部侍郎兼侍读范百禄为翰林学士给事中”条注文:“遣中使据王岩叟《纪年录》:光庭受命在六月十四日,刘摯行年后记甚详,今别见于彼。”^{[9]10644}罗泌《路史》卷十“观象之变,爻之动于是”条注文:“八卦小成,即八卦自重者,是造六

画矣。因而重之,则六十四矣。扬雄以为文王六十四非,有辨,别见。”^[10]《古今考》卷九“项羽分天下一帝十九王”注:“汉书高纪项羽传不书韩王成,别见下文故。”^{[11]853册245}还有《西山文集》《昌黎集注》《后山诗注》等文人诗集的注文中,亦大量使用“别见”。由此可知,董本在刘注中增添“别见”的作用,一方面出于精简注释、使之主次明晰的体例需要,故不一一引述;另一方面,提醒读者注文皆是语有所本,以最清晰的方式使涉及同一人物的前后注文相互贯通,从而增添注释的丰富性。

董本刘注中与“别见”相对的,还有“已见”。如政事 25“王东亭与张冠军善”注:张玄已见;文学 25“褚季野语孙安国”注:褚裒、孙盛并已见;棲逸 11“观其运用吐纳,风流转佳。加已处之怡然,亦有以自得,声名乃兴。后不堪,遂出。”注:僧渊已见,等等(另有文学 33、35、39、41、52、67;方正 5、18、21、24、44、46、49、52、53、57、58、66;雅量 12、38、42;识鉴 14、26;赏誉 5、8、29、46、59、76、96、106、108、135、137、150、152;品藻 13、28、40、42、63;容止 11、28、33、38;伤逝 8、14、18、19;棲逸 17、22、23、25;任诞 17、24、29、33、38、48;简傲 8、12、14;排调 1、7、10、11、20、26、30、37、39、46、49、54;轻诋 1、5、24;假谲 10;黜免 1、9、10;忿狷 2、3、7),旨在强调该人物在先前注文中已然出现,与“别见”相照应。如果说“别见”是以引用《世说》外的诸多文献记载来丰富注释内容,属于“文外证”,那么“已见”则更强调注释之间的前后照应,属于“文内证”。董本对“别见”和“已见”的增添,使刘孝标注文的体例显得更为完整丰富。

由上可知,宋本对刘孝标注文的删改主要集中于删除唐抄本中容易引起歧义和语句不通顺的部分,使之更为简净严谨,平易晓畅,便于理解;“别见”“已见”的注释结构的增添,彰显了注文的整体性,读来严谨丰富,摇曳生姿。

三、从宋本“减注”现象看注释的文体意义

董本对唐抄本的刘孝标注文大段刊落,属于“减注”现象。如此处理的根本原因,在于宋人对注释功能以及各条注释之间关系的认识。因此,“减注”的出现,对注释的文体功能确立有着重要作用。

在注文与正文之间的关系上,注文附属于正文而存在,即注释内容需与正文密切相关。出于补证目的的枝蔓内容,都属于删削对象。最为典型的,是董本将夙慧 3“晋明帝数岁,坐元帝膝上。……答曰:‘举目见日,不见长安’”一条的刘注全部刊落:

唐抄本注:案桓谭新论:“孔子东游,见两小儿辨,问其远近,日中时远。一儿以日初出远,日中近者:‘日初出大如车盖,日中裁如盘盖,此远小而近大也。’言远者:‘日月初出,怳怳凉凉,及中如探汤。此近热远怳乎?’明帝此对,尔二儿之辨耶也。”

唐抄本刘注以《新论》中的“两小儿辩日”故事,两个孩子从不同视角来判断太阳的远近、各有依据,以至于“孔子不能决”的事件,来映证晋明帝同时说出“不闻人从日边来”和“举目见日,不见长安”两个不同却充满辩证之理的答案,从而凸显明帝超越同龄人的聪慧机敏。刘注“明帝此对,尔二儿之辨耶”,明确指出该段注文是对正文的类比。然而由于此条注文与正文所涉及的人物事件毫不相关,故在强调注文“诠释性”的董本中被全部删除。与之类似的,还有豪爽 5:“晋明帝欲起池台,元帝不许。帝时为太子,好养武士。一夕中作池,比晓便成。今太子西池是也。”注文:

唐抄本:《丹阳记》曰:西池者,孙登所创,吴史所称西苑宜是也。中时堙废,晋帝在东,更修复之,故俗称太子西池也。

董本:《丹阳记》曰:西池,孙登所创,吴史所称西苑也。明帝修复之耳。

董本删削后的注文紧扣正文内容“明帝修复西苑”,至于唐抄本原有的“中时堙废,晋帝在东,更修复之”等涉及西苑修复背景之语,与正文无关,故予以刊落。因此,“减注”的真正意义,在于变“以注为补”为“以注为释”,精简后的注文完全围绕正文展开、为正文服务,对“注”的文体定位也与东汉时期诸家章句“就经而作”相同,即不具备完整的思想结构,仅为解读文本服务。

在注文与注文彼此间的关系上,董本通过在刘注中添加“别见”的方式加以缩略和提示,有明晰主次的作用。即使注文详略得宜,又提醒读者在阅读时参考前后文其他注释,将注视为整体而存在。如赏誉 85“会稽孔沈、魏颢、虞球、虞存、谢奉,并是四族之俊”注文:

于时之桀。沈、存、颢、奉并别见。虞氏谱曰:“球字和琳,会稽余姚人。祖授,吴广州刺史。父基、右军司马。球仕至黄门侍郎。”

注释独析虞球生平,对其余四人皆以“别见”略之,是因为孔沈在言语 44“孔廷尉以裘与徒弟沈”一则有出自《孔氏谱》的注文;魏颢在排调 48“魏长齐雅有体量”中有源自《魏氏谱》的介绍;虞存、谢奉二人分别在政事 3“虞存謩作郡主簿”和雅量 33“谢安南免吏部尚书还东”条注文内,有出自孙统《存谏叙》和《晋百官名》《谢氏谱》的详细小传。因此,“别见”既能精简注文篇幅,突出主要人物,又能提示读者参阅他条——每一条注文不是孤立零散的个体,而是相互勾连的整体。

文体定位,往往是审美旨趣的投射。董弅对《世说新语》的减注,一定程度上与宋人时代风气密切相关。一方面,宋人崇尚“理趣”,即分析文本客观而理性,用语需指向明确。因此,董本对唐本省略主语不恰当以至产生歧义之处加以增补,又对无关正文之处加以删削。另一方面,宋人主张行文简净。宋初孙何《答朱严书》云:“文之繁久矣,……既不能刊正经史之误,复不能明白仁义之奥,但披说蔓语,骈章赘句,长其编,大其轴,以多为贵耳。……足下师孔宗孟,交荀友扬,尤病今文之冗长,必欲去烦为简,使圣朝言无枝叶,章卓立而词振起,斯诚有志执圣训以救群言之乱者也。”^[12]曾巩也以“简”评说友人文章:“其辞反复辨达,有所开阐,其卒盖将归于简也。”^[13]¹⁵²王安石亦主张“词简而精,义深而明”^[14]⁷⁹⁸,故清代李绂评其文曰:“荆公平生为文,最为简古。其简至于篇无余语,语无余字,往往束千百言十数转于数行中;其古至于不可攀跻踪迹。”这种行文风尚自然影响到对注文的筛选上,刊落刘孝标冗余注文也就不足为奇了。

因此,在“尚简”的文学理念下,宋人将“注”的文体核心功能明确为“正文的解释”。伽达默尔认为:“诠释学的优越性在于它能把陌生的东西变成熟悉的东西,它并非只是批判地消除或非批判地复制陌生的东西,而是用自己的概念把陌生的东西置于自己的视域中并使它重新起作用。”^[15]⁴⁵¹有别于原本刘孝标注文可与正文对读的“互文”体系,“减注”现象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这种文、注之间的互动。如夙慧 2“何晏七岁,明惠若神,魏武奇爱之”注:

唐抄本:魏略曰:“晏父早亡,太祖为司空时纳晏母,并收养。其时秦宜禄、何鲡亦随母在公家,并见如宠公子。鲡性谨慎,而晏无所顾,服饰拟太子,故太子特憎之,每不呼其姓字,常谓之假子。魏氏春秋曰:晏母尹为武王夫人,故晏长于王宫也。”

董本:魏略曰:“晏父早亡,太祖为司空时纳晏母。其时秦宜禄、何鲡亦随母在公家,并见如宠公子。”

唐抄本所引的《魏略》材料,在解释曹丕宠爱何晏的同时,亦强调了何晏的张扬无忌,因“服饰拟太子”而让曹丕颇为憎恨,故“假子”称呼根本上是曹丕对何晏的轻蔑,而非董本减注后所强调的“并见如宠公子”。何晏的“无所顾”,不但与正文中他“画地令方,自处其中”并言“何氏之庐”之举形成互文,还暗伏其最终卷入政治斗争被杀的结局。所以,刘孝标注与《世说》正文,构成了一组对读关系,注文不仅对与正文相关的史料加以补充,而且意图解析晋人“简约玄澹”文辞背后的态度、了解故事的创作渊源。又如唐抄本刘注完整保存了“国宝别传”,多出宋本 248 字,将王国宝依靠从妹会稽王妃而获得佞幸,终因纵情放肆而被王恭所杀的来龙去脉交代得十分清楚,对正文中王国宝“弄权要”进行了细致而全面的描述,文、注之间构成了互文补充关系,绝非冗余之文。而宋本“减注”后,将原本自成体系的注文完全变成了正文的从属与解释,消解了正文与注释之间的互文关联。

综上所述,董弅刻本对刘孝标注文的删削,直接影响到了后世一系列宋本的翻刻。董本虽有诸多妄改之处,但也出于严谨角度考虑,删除容易引起理解歧义的部分,并留下考据甄别的痕迹。此外,董本在

注文中增添“别见”的省略方法,使注文详略有致而彼此勾连,显得更为完整丰富。“减注”背后体现的是宋人“尚简”的审美旨趣,以及将“注”的文体核心功能明确为“正文的解释”,附属于正文存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刘孝标原注中的文—注互文性。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董弅刻本的出现,是《世说新语》文本定型的重要一环。“定本效应”使《世说新语》的文本得以迅速普及,成为简便易读的“名士教科书”,从而进一步推动了《世说新语》的经典化进程。

[参 考 文 献]

- [1] 余嘉锡. 世说新语笺疏[M]. 北京:中华书局,2007.
- [2] 酈道元. 水经注[M]. 谭属春,陈爱平,点校. 长沙:岳麓书社,1995.
- [3] 黄寿祺,张善文. 周易译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 [4] 魏征,等. 隋书[M]. 北京:中华书局,2000.
- [5] 房玄龄,等. 晋书[M]. 北京:中华书局,2000.
- [6] 脱脱,等. 宋史[M]. 北京:中华书局,2000.
- [7] 王志邦. 浙江通史[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
- [8] 陈公亮,刘文富. (淳熙)严州图经[G]//李勇先,校点. 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乙编.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
- [9] 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M]. 上海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2004.
- [10] 罗泌. 路史:卷十·后记一[M].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1] 方回. 续古今考[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1986.
- [12] 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卷 105 [M]//中华再造善本.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
- [13] 启功. 唐宋八大家全集·曾巩集[M].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
- [14] 王安石. 临川先生文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 [15] 洪汉鼎. 当代西方哲学两大思潮下诠释学转向:哲学诠释学导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On the Deletion and Modification of Song Dynasty Block-printed Edition of *Shi Shuo Xin Yu* to Liu Xiaobiao's Annotation of Tang Dynasty Codex —on the Stylistic Significance of "Reducing Annotation"

Wang Yijia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Dissemination of *Shi Shuo Xin Yu* has been came into the printing era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1138). However, the Song Dynasty block-printed edition has a centralized deletion about the Liu Xiaobiao's annotation of Tang Dynasty codex, which are in words or paragraphs. This paper is based on literature comparison, and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auses. Firstly, it cancels these ambiguous positions and geographical terms; secondly, it adds a structure that named "biejian" and "yijian", in order to complete the style of writing. On that basis, it further discusses the stylistic significance reflected by the phenomenon of understatement.

Keywords: *Shi Shuo Xin Yu*; Liu Xiaobiao's annotation; reduce the annotation; stylistic significance.

[责任编辑:陈忻]